
小說月報

百花獎作品集

上

百花文藝出版社

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集（上册）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6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33,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

书号：10151·869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小说月报》首届百花奖，完全由读者投票评选，选出的十六篇作品，不但以其较强的可读性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而且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高水平，是专家和群众都公认的小说佳品，正因如此，著名作家王蒙称赞这次评奖是“创举”，并特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本书是这十六篇获奖作品的结集，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计十篇：张贤亮的《绿化树》（中篇）、姜汤的《新客规今天生效》、陆文夫的《门铃》、梁晓声的《为了收获》、邵振国的《麦客》、何晓鲁的《历史选择了他》、冯骥才的《雪夜刺客》、周克芹的《晚霞》、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中篇）、王蒙的《葡萄的精灵》。

序

王 蒙

《小说月报》举办了“百花奖”，通过读者投票的方式，直接决定获奖作品的篇目，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创举。

现在，人们愈来愈懂得“信息反馈”的重要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论搞什么，没有反馈，就没有调整、发展与提高，就无法摆脱幼稚性、主观性与盲目性。作家们写了小说，编辑们发表了小说，把信息输出给了读者，那么读者呢，我们将从读者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反馈的信息呢？投票推选自己所认可的优秀作品，可以说是这种信息反馈的一种简单明了而又重要的形式。

近年来，各种文艺团体和文学刊物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小说作品评奖。这些评奖对于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新人的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些评奖，基本上都是采取由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组成评委会，再由评委会参考读者反映予以协商决定或投票决定的方式。这种方式当然是有相当的权威性的，因为文学正象别的“学”一样，是一门“学”，需要倾听精通这门“学”的专门家的意见，力求作到分析精辟、评价公允、褒奖适当。

那么，能不能直接由读者发出决定性的声音，用“选票”

来决定获奖作品的取舍呢？有的同志对这种作法持怀疑态度。他们顾虑一些读者可能仅仅从“可读性”出发，推选一些并无多大文学价值与思想意义的“畅销”之作，他们也顾虑一些很好的作品可能由于写得艰深了一些或形式奇特一些便受到读者的冷落。假如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读者投票直接推选出来的作品，至多只能是通俗作品中的受欢迎者，它的价值就会是颇具局限性的了。

因此，《小说月报》举办这样活动，带有试验的性质，夸张一点说，还有点冒险呢。

然而事实却令《小说月报》的同志和一些文艺界人士大为高兴。事实上我们的读者对于严肃的文学作品是具有相当高的鉴赏能力和相当准确的评价能力的。首先，一些概括了巨大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我国实现“四化”、改革的现实进程与个中矛盾冲突的作品，受到了最多的读者的举荐。与此同时，一些艺术上有特色、有追求，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的作品也受到读者的充分的（应该说是恰如其份的）注意。《小说月报》的编辑同志告诉我，他们认为投票的结果“十分理想”。

这就好了。这就说明，我们的读者的水平日益提高和已经提高。这就说明，群众性的投票常常可以弥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见与好恶的偏颇。这也说明，刊物、作品、读者三方面是互相选择、互相作用的。一本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是单纯追求销数和赢利的刊物必然会团结住一批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者和读者，如果你自己没有搞低级趣味、噱头主义，你就大可不必担心读者趣味低级、不懂文学艺术。这还说明，尽管读者或有可能有时为了消遣等目的阅读（甚至是津津有味地阅

读)一些价值不高的通俗读物(决不是说一切通俗作品价值都不高)，但“或可一读”并不意味着推崇赞赏，读者的眼睛仍是亮的，读者对文学、对小说作品的态度仍然是相当严肃的。

而从作者来说呢？得到评论家、同行和有关领导部门的肯定固然是可喜的，直接得到读者的肯定，不也是十分十分重要的吗？不是也应该十分重视读者的意见、珍视读者的爱护吗？与其担心读者不理解自己，不是更应该考虑一下自己是否理解读者吗？不是完全可能从读者的反馈的信息中，得到一点启发吗？

谢谢读者！我们有多么好的读者！在今天的中国从事文学编辑和创作、评论等工作，确实是值得骄傲和欣慰的。

目 录

- 序.....王 蒙(1)
- 绿化树.....张贤亮(1)
- 新客规今天生效.....姜 汤(179)
- 门铃.....陆文夫(214)
- 为了收获.....梁晓声(229)
- 麦客.....邵振国(265)
- 历史选择了他.....何晓鲁(300)
- 雪夜来客.....冯骥才(328)
- 晚霞.....周克芹(335)
- 北方的河.....张承志(358)
- 葡萄的精灵.....王 蒙(462)



张贤亮

绿化树

〔作者简介〕张贤亮，男，一九三六年生于南京市。一九五五年高中毕业，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并发表作品。一九八〇年一月任《朔方》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宁夏分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中篇小说《龙种》、《河的子孙》、《浪漫的黑炮》等。一九八一年，出版了小说集《灵与肉》，收入六篇作品，其中《灵与肉》获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改编为电影《牧马人》）。《肖尔布拉克》获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先后获小说月报首届百花奖及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曾用这样的话，形象地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当然，他指的是从沙俄时代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这话对于曾经生吞活剥地接受过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我和我的同辈人来说，应该承认也是有启迪的。于是，我萌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写一部书。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这“一部书”，总标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确切地说，它不是“一部”，而是在这总标题下的九部“系列中篇”。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绿化树》，就是其中的一部。

—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

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翘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然而，车把式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磕膝弯紧夹着

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象陷阱似的桥面。

牲口并不比我强壮。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你还是活过来了。”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但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用一种冷漠而略带悒郁的目光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有时，他机械地晃动一下手中的鞭子。他每晃动一下，那几匹瘦马就要紧张地抖动抖动耳朵。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枣红马更为神经质，尽管车把式并不想抽打它。

我理解车把式的冷漠与无动于衷：你饿吗？饿着哩！饿死了没有？嗯，那还没有。没有，好，那你就得干活！饥饿，远远比他手中的鞭子厉害，早已把怜悯与同情从人们心中驱赶得一干二净。

可是，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边瞧着几匹比我还瘦的牲口，一边用饥荒年代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和善语气问他：

“海师傅，场部还远么？”

他分明听见了，却不答理我，甚至脸上连一点轻蔑的表情也没有，而这又表示了最大的轻蔑。他穿着半新的黑布棉裤褂，衣裳的祥纽扣很密，大约有十几个，从上到下齐整的一排，很象十八世纪欧洲贵族服装上的胸饰。虽然拉着他的不过是三匹可

怜的瘦马，但他还是有一种雄豪的、威武的神气。

我当然自惭形秽了。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我仍然兴致勃勃。今天，是我出劳改队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按管教干部的说法是，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没有什么能使我扫兴的！

确切地说，这只是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的地界，离有人烟的居民点还远得很。至少现在极目望去还看不见一幢房子。这个农场和劳改农场仅有一渠之隔，但马车从早晨九点钟出发，才走到这里。看看南边的太阳，时光大概已经过中午了吧。这里的田地和渠那边一样，这里的天更和渠那边相同，然而那条渠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线。

车路两边是稻田。稻茬子留得很高。茬口毛茸茸的，一看就知道是钝口的镰刀收割的。难道农场的工人也和我们一样懒，连镰刀也不磨利点？不过我遗憾的不是这个，遗憾的是路两边没有玉米田。如果是玉米田，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

遗憾！这里没有玉米田。

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象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隆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

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

大车在丁字路口拐了弯，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象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都不见了。回头望去，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糟糕！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

我分开枯败的芦苇，越过一条渠，一条沟，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营业部主任”正拿着一个黄萝卜，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一面斜睨着我，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

“祖宗有灵啊——”

“祖宗有灵”是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譬如，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分配到一个比较轻松而又能捞点野食的工作；或是碰着医生的情绪好，开了一张全休或半休的假条……人们都会摇头晃脑地哼唧：“祖宗有灵啊——”这个“啊”字必须拖得很长，带有无尽的韵味，类似俄国人的“乌拉”。

我瞟了一眼：他手中的黄萝卜不小！这家伙总交好运道。

“营业部主任”也是“右派”，但听他诉说自己的案情，我却觉得他不应属于“右派”之列，似乎应归于“腐化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一类才恰当。他自己也感到冤枉，私下里说是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当在“生活检讨会”上，他知道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的人，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时，会后曾悄悄地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

“象你，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哩！浪过世面，吃

过香的喝过辣的！象我，从小要饭，后来当了兵，他妈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熊！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再叫我当‘右派’也不冤哩……”

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对我态度好一点，相反，还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刻骨的忌恨嘲讽我，以示他毕竟有个什么地方比我优越。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我更为衰弱，一脸稀疏肮脏的黄胡须，鼻孔常常挂着两条清鼻涕。他不敢跟我斗力，却总是把他的外援和好运气在我面前炫耀，以逗引出我的食欲和馋涎。他知道这才是最有效的折磨。我对他也有一种直觉的反感，老想摆脱他却摆脱不了。因为都是“右派”，分组总分在一起。这次释放出来，他也由于家在城市，被开除了公职，又和我一同分到这个农场就业。

这是一块黄萝卜田。和青萝卜田不一样，黄萝卜田里是没有畦垅的，播种时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满田都是。撒得密的地方黄萝卜长得细小，挖掘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下的。但这块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再加上地冻得梆梆硬，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了许多有苗苗的地方也没找到一个。

“营业部主任”刮完了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嚼冰糖一样把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有意把萝卜的清脆、多汁、香甜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萝卜好！还不糠……”他趁咽下一口时，这样赞扬。

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我是有经验的。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可想而知，这样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营业部主任”的好运道就表现在这里！

然而我今天却毫不气恼。我站直腰，宽怀大度地带着勉强的微笑从他面前走过去，斜斜地抄条近路去追赶那辆装着我们行李的大车。

二

是的，我今天情绪很好。早晨，吃劳改农场最后一顿饭时，因为我们这些已经被释放的就业人员可以不随大队打饭了，在伙房的窗口，我碰见了在医院里结识的病友——西北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讲师。他也被释放了，正在等农场给他联系去向。

“章永磷，你要走了吗？”

尽管他还穿着劳改农场的服装，胸前照例有一大片汤汁的污点，却用最温文尔雅的姿势祝贺我，还和我象绅士般地握了握手。这种礼节，对我来说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了。可奇怪的是，这种最普通的礼节又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我原来很熟悉的世界。于是，我也尽可能地用十足的学者风度在吵吵嚷嚷的伙房窗口与他交谈起来。

“那本书怎么办？”我问，“怎么还你呢？给你寄到……”

“不用！”他一手托着一盆稀汤，一手慷慨地摆了摆，那姿态俨如在鸡尾酒会上，“送给你吧！也许……”他用超然的眼光看了看四周，“你还能从那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你指的是我们？还是……”我也谨慎地看了看打饭的人群。有一个犯人嫌炊事员的勺子歪了一下，正声嘶力竭地向窗口里吵着定要重舀。“还是我们……国家？”

“记住，”他的食指在我胸前（那里也有一大片汤汁的斑点）戳了一下，以教授式的庄重口吻对我说，“我们的命运是和

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对他的话和他的神态，我都很欣赏。在人身最不自由的地方，思想的翅膀却能自由地飞翔。为了延长这种精神享受，我虽然不时地偷觑着窗口（不能去得太晚，窗口一关，炊事员就不耐烦侍候你了。即使请动了他，他也要在勺子上剋扣你一下，以示惩罚），同时也以同样庄重的口吻说：

“不过，第一章很难懂。那种辩证法……用抽象的理论来阐述具体的价值形成过程……”

“读黑格尔呀！”他表情惊讶地提示我，仿佛我有个书库，要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似的。接着又皱起眉头，“要读黑格尔。一定要读黑格尔。他的学说和黑格尔有继承关系。读了黑格尔，那第一章《商品》就容易读懂了。至于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二篇《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就不在话下了……”

“是的，是的。”我用在学院的走廊上常见的那种优雅姿态连连点头，“仅仅那篇《初版序》就吸引了我，可惜过去，我光读文学……”

我们这番高雅的谈话结束得恰到好处。他和我告别，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盆稀汤走后，我扑到窗口伸进罐头筒，炊事员正要往下撂板子。

“你他妈的干啥去了？！”

“我帮着装行李来着。”我马上换了一副嘴脸，谦卑地、讨好地笑着，“我这是最后一顿饭啦！”

“哦——”炊事员用眼角瞟了我一下，接过我的罐头筒，舀了一瓢以后又添了大半瓢。

“谢谢！谢谢！”我忙不迭地点头。

“等等。”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炊事员擦着湿漉漉的手走到窗

口，探头看着我，“你狗日的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个吧？”

“是的，是的。”他亲昵的语气使我受宠若惊，给了我一种不敢想象的希望。

“你真他妈的不易！”果然，他从窗口旁边的笼屉里拿起一对昨天剩下的稗子面馍馍，拍在我象鸡爪般的手上，“拿去吧！”

还没等我再次道谢，他们俩就“啪”地撂下了黑渍渍的窗板。他们不希罕别人感恩戴德，这样的话他们听得太多了，听腻了。

这才是真正的“祖宗有灵”！罐头筒里有一瓢又一大半瓢带菜叶的稀饭，手里还有两个稗子面馍馍。两个！不是一个！这两个馍馍是平时一天的定量：早上一个，晚上一个。稀饭是什么样的稀饭啊！非常稠，简直可以说是粘饭！打稠稀饭，也是我们平时钻天觅缝地找都找不到的机会。由于加菜叶的稀饭里放了盐，这种饭会越搅和越澀。炊事员掌握了这个规律，他可以随他的兴致和需要，要么在开饭之前拚命地搅一阵，把稠的翻上来，于是排在前面的人就沾光了——“祖宗有灵”！要么稳稳地一瓢一瓢撇，那么稠的全沉了底，排在后面的人就鸿运高照！后一种情况，多半出现在炊事员因为忙而自己在开饭前没有吃上饭的时候——他们要把桶底的稠饭留给自己吃。一般情况下，炊事员们是希望我们争先恐后地跑来打饭的——早吃完饭他们早休息。可是，谁也不知道炊事员在哪顿饭处于哪种情况；况且我们的人数又非常多，伙房里有十几个将近一人高的大木桶，更预测不到炊事员准备把哪一桶稠饭留给自己吃……总而言之，打稠饭的机会比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化还难以捉摸，完全要靠偶然性，靠运道。

今天我的运道就很好！

而这恰恰在我开始新的生活的第一天！

这是个好兆头！

所以我非常高兴！

三

其实，我平时也比一般犯人吃得多，只要是打稀饭，而不是稗子面馍馍，我总要比别人多100cc左右。诀窍就在于我这个罐头筒。

自一九五九年春天伙房不做干饭，只熬稀粥以后，劳改农场即刻兴起了用大盆打饭的风气，瓷碗很快就淘汰了。因为炊事员舀汤的速度相当快，如果用小口饭具，瓢底沥沥拉拉的汤汁就会滴回到桶里，这无疑是个损失。用敞口饭具，瓢底的汤汁当然会掉到盆里，归于自己了。脸盆太大，磕磕碰碰地不好往窗口里送，并且稀饭会沾得满脸盆都是，反而得不偿失。那必须是比脸盆小，而又比饭碗大的儿童洗脸用具。在困难年代，这种用具是很难买到的。然而“营业部主任”有办法。我怀疑他连百货公司的儿童用品也偷到家里囤积了起来，或是他的余党还没有抓尽。反正，他让每月都来探望他一次的那个与他同样讨厌的老婆，替组里每人都代买了一个。当然，他不会白白地效劳的。他经常在我面前吹嘘，他人虽然送来里面了，而在外面却依然如何如何“有办法”。就象蜘蛛结好了网，等待小虫扑到上面去一样等待我向他求告。那时，他就会摆出各式各样的面孔，说出各式各样的话来取笑我。可是我偏偏不买他的账。我身无分文，又没有外面寄来的食品付给他这个掮客作佣金。我母亲在北京寄人篱下，靠给街道上编织塑料网袋，每月挣十来块钱生活，我没有面皮再向她老人家要求寄什么东西。但我